

他主导了联合国历史上 **最富有成果** 的会务改革

他“**温和而坚定**”的外交风格，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是联合国原副秘书长—— **陈健**



外交， 让世界走向和谐

陈 健 / 编著

陈 健 / 编著

外交

让世界走向和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交, 让世界走向和谐/陈健编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300-14871-7

I. ①外… II. ①陈… III. ①陈健-生平事迹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1081 号

外交, 让世界走向和谐

陈 健 编著

Waijiao, Rangshijie Zouxiang Hexi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13.5 插页 2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45 000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上 外交理念篇

第一章 联合国是外交的大课堂 / 3

联合国有一个好处：它是培养和训练低级外交官的绝佳场所。怎么样临场应对即席答辩，这个基本功对于搞外交工作是很有用的，对于我以后做发言人，更为受益。

第二章 联合国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联合国 / 20

联合国成立初期相当长时期里面，可以说长达 25 年的时期里面，基本上是由美国操纵或者说是由美国主导。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后，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也壮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

第三章 韬光养晦精神万岁 / 50

——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国际环境

中国选择了融入国际社会寻求自身的发展，中国不挑战现有的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而是借助这个国际秩序去发展。

第四章 一超尚存，独霸难行 / 65

——谈奥运后的国际形势

这个世界的特点就是一超尚存，独霸难行，是一超多强协商共治的局面。当然关系不是绝对平等的，美国实力超过其他国家，但是单靠它一个国家来办事情办不到了，还需要同大家一起协商。

第五章 大步走向“挨骂”的时代 / 76

——新中国六十年国际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可能出现几个西方国家联手起来遏制中国的局面，这就是中国国际环境、国际关系当中所谓机遇的最基础性的东西。

第六章 互谅互让是和谐的基础 / 96

——谈模联活动要学的三项本领

十几年联合国工作的经历使我明白了陈述、说服和折中这三种能力的重要性。

第七章 永远不当老大 / 102

——变革时代的联合国和全球治理的新架构

中国永远不会取代美国当老大，称霸世界。我想这不是故作谦虚，也不是一般的韬光养晦之举。

第八章 机遇和挑战 / 114

——论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总体来看，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会经历一个叫做“成长的孤独”和“成长的烦恼”的时期。所以要耐住性子，忍受猜忌和指责，潜下心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争取在和平的环境当中，茁壮成长，进入壮年时代。

下 外交艺术篇

第九章 给外交的施展更大的回旋余地 / 125

——与人民网网民谈联合国及中国外交

不管我们发展到哪个阶段，我们都要继续奉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我们谈韬光养晦，主要是指我们对外工作当中、外交工作当

中，不扛大旗、不挑头、不搞对抗，埋头发展自己。

第十章 外交身段要刚柔相济，柔不是软 / 140

——与新华网网民谈联合国及中美、中日关系

我觉得中国的外交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只要轻轻地讲一句话人家就会听，以前需要大声疾呼。现在我们尽管是很轻地讲话，很柔和地处理问题，人家都特别关注。

第十一章 国家核心利益要坚决捍卫，但不要扩大化 / 154

——接受日本媒体联合采访

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发展，第二是台湾。这两个问题没有商量，哪个国家哪个人要损害我们这两个核心利益，我们中国坚决不能同意。

第十二章 温和而坚定的外交风格 / 163

我的性格是比较温和的，我从学生时代开始处世就一直是平和的，不喜欢用激烈的语言，不喜欢讲话不留余地，但是当我阐述中国政府的政策时，我没有退让的余地。

第十三章 关于军备透明与自信 / 169

我们要有一个宽阔的胸怀，一个包容的胸怀，在全球化时代更应该这样。

第十四章 影响可以，干涉不行 / 174

美国在本地区乃至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中国并无意采取任何主动行动来排斥它对本地区的影响。但是我们反对任何基于霸权主义之上、违背本地区有关国家包括中国利益的干涉行为。

第十五章 为亚太地区的安全而共同努力 / 177

中日两国在亚洲地区事务中发挥应有作用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只要我们真正关心中日两国的前途，关心亚洲地区和平安全状况，放弃陈旧的观

念，敞开心胸，容纳对方，就必定能在曲折的道路中找到曲径通幽的方法。

第十六章 大刀阔斧改革 积极施展才能 / 182

——揭秘联合国大会管理“内幕”

对于陈健所进行的改革，安南给予了充分支持，他曾经称赞说，“陈健的改革，是联合国历史上最深刻的改革，是联合国各项改革当中最富有成果的”。

第十七章 联合国外交的新课题 / 188

——为纪念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四十周年而作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我国海外利益的不断拓展，我们正从一个在海外没有重大实际利益的国家变成在海外有广泛实际利益的国家。从利比亚内战和赞比亚大选对我国造成的影响已是观一叶而知秋。

第十八章 准确把握自己 不争老大地位 / 193

——读《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有感

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已在多个场合表示中国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取代美国全球老大的地位。最近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更是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

附录一 妙语连珠，幽默睿智 / 197

——陈健妙语折服西方记者

附录二 追求真理 服务社会 / 202

——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会专访

后 记 / 210



外交理念篇

第一章

联合国是外交的大课堂^{*}

今天应邀谈谈我的外交生涯。

说起来，我跟联合国的确还是有缘分的。从两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来，一件事情就是 1964 年我从复旦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毕业的时候，我本人并不想到外交部工作。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还不是共青团员，也不关心政治，所以脑子里没有到外交部工作、到政府部门工作的想法。我就想搞搞学问，做什么呢？首先我想考研究生，研究西方美学，这是我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英文对外广播，我们学英文的，那时候天天听这个，我挺佩服里头几个播音员，声音很好听，第二个志愿是考这个。但不管我怎么努力，这两项目标、愿望都没有能够实现，最后还是把我分配到外交部了，后来我知道，这不一定是我考得不好，而是内定了要我到外交部的，我怎么扑腾，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 本文根据陈健大使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席邀请于 2007 年在同心讲座上所发表讲话的录音整理。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分配到外交部后。到了外交部并没有让我们到部里去工作，我和同时招的二三十名全国各个外语院校的毕业生被送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叫北京外国语大学）去进修，那时候叫翻译班。加上 63 届的和 65 届的学生，实际上一共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翻译班进修的差不多有八九十人。那么为什么外交部把我们这么一大批人招去以后，不到外交部工作，放在那里呢？后来才知道，当时估计中国快要进联合国了，把这些人招来储备，准备一旦进联合国派用处。为什么当时外交部会有这么个考虑呢？因为联合国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了，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一大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殖民地国家取得了独立，参加了联合国，慢慢改变了联合国里头的力量对比。同时 60 年代的时候中法建交，中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有所改善。所以，中国参加联合国，用我们的政策性语言来说，即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我们就被储备在那里。现在看来，储备在那里的近 100 个学生当中，后来真正进联合国的只有寥寥几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说缘分，首先一个缘分，好像我命中注定要到联合国去一样，不管我怎么奋斗都离不开这个。

到了外交部翻译班学习以后，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后来我们到牛田羊军垦农场一年半，江西干校一年半。到 1971 年，我们这批人又陆续调回外交部。1971 年初，上级发个调令让我回外交部，到哪里工作呢？

到外交学会工作，当时我正好在担任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的副组长，正在关键时候，走不开。怎么办呢？江西干校的校领导就让另一位同志先回去，顶替了我到外交学会工作。等我做完“五一六”的调查，外交学会的工作已经没有了，上级就安排我在欧美司的国际组负责关于联合国的工作。所以这两次偶然的机会似乎注定了我今后要做联合国的工作。

这十几年的联合国工作，我有什么感受，学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呢？首先，从我到欧美司国际组说起，当时给我分配的第一项工作是计票，估算一下那年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两阿提案”）能得多少票。那是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共同发起的一个提案。美国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提案反制“两阿提案”。我的任务是估计一下票数，美国的提案通得过或者通不过，我们的提案通得过或者通不过。我凭什么来估计呢？我就凭各个使馆报回来的情况，跟报纸上透露的情况来统计，按照我统计出来的票数，那年我们打败美国重要问题提案的票数刚刚超过半数，能够打败美国的提案取得胜利。我看到这个消息当然很激动，马上拿去找我们的领导。我的领导说：“小伙子，沉住气，要留有余地。”他调整了一下，按照他调整之后，投票的情况可能势均力敌，我们取胜的可能性很大。但是，美国的阻挠也不能排除。这就是我到外交部上的第一课，叫做“留有余地”。以后我学到了这一点，就是：“讲话要留有余地，办事要掌握分寸。”为什么要留有余地呢？后来越来越体会到，就是人家口头答应你的，到时候能不能兑现，兑现的时候才能算数。

我上的第二课，就是那年（1971年），美国的提案果然被打败了。恢复中国代表权的“两阿提案”通过了，我们所有搞联合国工作的人都非常振奋。终于我们要进去了，外交部领导觉得中国进不进去这样重要

的问题，不能由外交部来定，要由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来定，这又给我上了一课，叫做“外交无小事”。当然这件事情本身也不是小事。那个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去到底符合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出现呢？因为在这之前的25年，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之下，将中国拒之门外达25年之久，还发动了朝鲜战争，并且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一个决议，诬蔑中国和朝鲜是侵略者。

现在提案一通过我们就进去了，这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个事情还得由中央来定，后来毛主席、周总理英明决策，我们不能辜负世界上绝大多数友好国家和人民对中国的支持，应该进去。而且中央领导很重视，亲自选派了第一批去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由乔冠华担任团长，周总理率领了政治局的领导到机场送行。从此，中国和联合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这个角度讲，1971年恢复中国代表权决议的通过，不光是中国和联合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联合国里头力量对比的一个转折点，某种意义上也是联合国性质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第三世界已经成为联合国的多数，美国一家操纵联合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代表权决议的通过也是对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极大鼓舞，在这个形势的推动之下，在整个70年代第三世界高举反帝、反殖旗帜，通过联合国大会里头掌握的多数，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维护了它们的权益。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决议，就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当时我参加了这场斗争，这场斗争很艰苦，因为它的基本出发点是要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确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否定《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货币基金、世界银行这一套游戏规则，另立一套公

正的、对第三世界更有利的、第三世界有更大发言权的游戏规则。在这场斗争当中，我们中国代表团是跟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的，我们一起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经过艰苦的谈判以后，达成了一个折中案文，正在准备付表决的时候，美国、德国，还有一个国家（可能是日本），他们认为：“不行，这个方案虽然吸收了我们好多意见，体现了折中妥协的精神，但是在几个关键问题上还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如果要通过这个提案的话，我们要求投票表决。并且对有些段落要投反对票。”大家知道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虽然没有约束力，但是它有道义力量，如果有的国家投了反对票，这就为其拒绝执行这个决议提供了借口，也削弱了所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的道义力量，所以我们同一些发展中国家一起商量，不能让这种情况出现，针对这三个西方国家的态度，我们提对案，即如果要投票表决，我们就回到原始案文，拿高方案来投票，我们这个主张一提出来，美国就软下来了，因为这高方案里头有很多对其不利的措施，包括国有化等等一系列的内容。结果各方达成妥协，未经表决协商一致通过。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为宗旨而提出并通过的历史性的文件。

二

我第一次被派到联合国工作是 1972 年，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给老同

志做翻译。分配给我的任务是给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陈楚大使（后来当了日本大使，再后来当了国务院外办主任）当翻译。陈楚大使不懂英文，但是中文“呱呱叫”，他是办报出身的。给他当翻译难度相当大，我干得很艰苦。我在复旦大学英文系念了五年，英文底子还是过硬的，后来又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练英语会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能够胜任翻译工作的，但是我做不了，什么道理呢？就是由于“文化大革命”荒了两年，我到牛田羊军垦农场劳动了一年半，江西干校又待了一年半，加起来相当于五年时间没有接触外语。语言这个东西是个活的东西，你用它，它就熟，不用它，不管你以前学得再好，就没了。所以我到联合国以后第一项要学的事情就是学语言，怎么学呢？向谁学呢？我找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向电视学。我们中国常驻代表团驻地是个旅馆，条件不大好，但是有一个好处，



陈健，1972年摄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驻地楼顶游泳池旁。

每个房间有一部电视机。美国电视有个好处，就是每天二十四小时有电影，也有其他新闻节目，我就利用了这个条件。我看电视时搬个桌子放在我的前面，拿个本子，记它的词汇，记它的短语，学它的文字，还学它的腔调。这么苦练了五年，我觉得我的英语不仅是恢复了，而且某些方面还有所长进，长进在什么地方呢？腔调。我们不少在中国学外文的人，腔调方面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中

国腔，这个不可避免的；另外一个是我们学的时候用的教材比较老，所以学的是 19 世纪的语言，跟现代的语言不一样。电视语言是最现代的，所以这五年的艰苦奋斗还是有收获的，使得我语言的腔调比较接近现代美国人，接近联合国里头讲的语言。这一课对我以后的工作，特别是后来到联合国秘书处工作，大有裨益。

20 世纪 70 年代我们在联合国里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时我们主要把联合国看作一个讲坛，利用联合国这个讲坛宣传我们的外交思想、外交路线，当时我们讲了个“三个世界”的理论，讲了反对“霸权主义”。这在联合国是独树一帜，就我们中国一家是这样一个“调子”。我们的立场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拥护，每次我们发言以后，他们都长时间热烈鼓掌。他们私底下告诉我们说：“中国说出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就这样，我们发展和巩固了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战斗友谊，同时也并没有得罪美国。为什么没有得罪美国呢？从当时的反应就看出来了，每次我们讲完话以后，苏联总是要答辩的，美国从不和我们答辩。他们后来也告诉我们，他们心里有底，他们知道我们讲的是革命的道理，但是不输出革命。所以他们内部用了一句话，叫做“放空炮”，中国人讲话是“放空炮”，听听就算了，不要紧的。

在联合国工作还有一个好处，这里不像双边外交那样讲究对等，比如苏联如果是大使来发言，我们就可回答他。如果是双边外交的话，我们必须由大使来回答他。联合国里头只要你坐在中国这个牌子后面，不管你是谁，都可以代表中国讲话。有时我们的代表讲完话走了，结果苏联答辩了，像我们这样低级别的外交官也有机会去进行反答辩。我第一次答辩的时候战战兢兢，基本上就是把我国代表原来讲过的话换个说法

重复一遍，但是经过这么几次以后练出来了。我后来曾经说，联合国有一个好处：它是培养和训练低级外交官的绝佳场所。所以我觉得在联合国，怎么样临场应对即席答辩，这个基本功对于搞外交工作是很有用的，对于我以后做发言人，更为受益。

三

我第二次到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是 20 世纪 80 年代了。80 年代的联合国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总体上来说，70 年代和 80 年代都是两条线交叉，一个是南北之间的对抗，一个是东西方之间的对抗，两条线在联合国里头交织在一起，70 年代这个交织主要表现为斗争的一面，到 80 年代主要表现为美苏之间的缓和，以及第三世界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全球谈判，所以 80 年代，在联合国是个对话和谈判的气氛。

当时我在代表团的分工是管经济，正好就是负责全球谈判。所谓全球谈判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那就是经过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发现自己也有一个软肋，那就是依赖于石油输出国的石油供应和稳定的石油价格，所以它们想通过某种方式的谈判来使得石油输出国组织在这方面作出承诺，保证石油的供应，稳定石油的价格。发展中国家则想利用石油牌来压发达国家在援助方面和金融体制改革方面作出让步，让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等机构有更多的发言权，能够获得更多的